

买卖没有强迫的,友好都是互动的

■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无论是人与人,还是国与国,友好从来都是互动的。中国现在是韩国的最大贸易伙伴,韩国对中国的贸易顺差累计达到4500亿美元,如果韩国政府和一些企业想当然地认为这些都是不可逆转的,在享受“友好交往”红利的同时破坏双方关系,他们就会尝到乐天正在吞咽的苦果。

韩国乐天集团在中国的生意越来越艰难了,不少门店已经是门可罗雀。韩国一些媒体据此炒作“中国报复萨德”,认为中国缺乏大国风度。国内也有个别“意见领袖”在网上发表言论,批评中国消费者对乐天的抵制行动不理智。“生意的归生意,政治的归政治”,这些言论看似理性中立,却忘了市场交易最基本的原则应该是自愿。

乐天进入中国市场以来,业务不断拓展,仅去年一年的交易额就达到了3.2万亿韩元。乐天的成功离不开中国消费者的认可和支持,双方之间不是简单的买卖关系,还应该有彼此尊重的感情交往。但是,乐天这次不顾中国民众的感受,执意与韩国军方签署“萨德”系统部署用地协议,并且扬言即使

在华遭受损失也要支持部署“萨德”。有句俗话说“散买卖不散交情”,而乐天先把“交情”给破坏了,买卖不可能不散。乐天既然要把自己打扮成“求仁得仁”的英雄,就该平静地接受这个略显残酷的现实。

因为不满乐天对“萨德”部署用地协议的态度,中国民众自发地抵制乐天,作为消费者,他们完全有这个权利。无论韩国媒体怎么炒作,买卖是不能强迫的。有人说,对乐天“以牙还牙”缺乏大国风度,其实这恰恰是大国国民应有的风度和作为。面对事关国家安全的问题,中国民众是有底线的,不会无原则地做“好好先生”。在此之前,中国已经明确警告乐天“后果可能是严重的”,但乐天不为所动,他们可能以为中国人只会动动

嘴皮子,过段时间就忘掉了。事实证明,中国民众说到做到,你敢碰触我们的底线,我们一定会让你尝到难以承受的苦果。

中韩建交已有25年,其间双方贸易往来日益频繁,如果经济和文化的交往能够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中国民众当然很愿意看到共赢的局面。而现在两国关系因为韩国政府在“萨德”问题上一意孤行,已经走向“冰点”,中国民众自发地抵制乐天,进而抵制韩国影视剧或者不再去韩国旅游,也都是情理之中的事。我们想以邻为伴,他们想以邻为壑,在事关国家安全的原则问题上都谈不拢,再一厢情愿地推动经济和文化交往,岂不是“热脸贴冷屁股”?无论是人与人,还是国与国,友好从来都是互动的。中国现在是韩

国的最大贸易伙伴,韩国对中国的贸易顺差累计达到4500亿美元,如果韩国政府和一些企业想当然地认为这些都是不可逆转的,在享受“友好交往”红利的同时破坏双方关系,他们就会尝到乐天正在吞咽的苦果。

民众与官方互动,舆论配合外交,共同维护国家安全,这在很多国家都是常见常用的策略,中国民众还需要不断积累经验。为抗议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一些城市在抵制日货时曾经出现了打砸抢行为,而这次对乐天的抵制在总体上是文明的、理性的,展示了大国的不怒而威。中国不断增强的国民凝聚力将是韩国政府不得不慎重考虑的现实,毕竟不是什么都能靠“萨德”拦截的。

节用裕民,从政府过紧日子开始

■公民论坛

□王石川

3月5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开幕。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各级政府要坚持过紧日子,中央部门要带头,一律按不低于5%的幅度压减一般性支出,决不允许增加“三公”经费,挤出更多资金用于减税降费,坚守节用裕民的正道。

总理话音刚落,全场就响起热烈掌声。这掌声,代表着赞赏,更意味着认同,认同各级政府要坚持过紧日子,认同“决不允许增加‘三公’经费”。事实上,本届政府在履新之初公布的“约法三章”,其中就包括公费接待、公费出国、公费购车只减不增。按照李克强总理的说法,“中央政府要带头做起,一级做给一级看。”

过去四年,“三公”经费确实只减不增,备受公众诟病的

公款吃喝大大减少,违规出国、超标配车的行为也受到明显遏制。这就说明“决不允许增加‘三公’经费”绝非说说而已,而是真抓实干,体现在行动之中。

“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政府就要过紧日子。”无论打造简朴政府还是民生政府,都必须削减政府开支,把节省下来的钱用在民生上,用在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上。有个背景不能不提,中央财政收入不可能始终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而民生支出是刚性的,惟有坚守节用裕民的正道,才能更好地取信于民,造福人民。

政府要带头过紧日子,李克强总理不仅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多次强调过,还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一再重申过。比如在去年11月29日的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要求有关部门,确保所有行业税负都“只减不增”,“各部门一定要统一思想,财政收支压力再大,也要积极为企业减税减负。要让

企业过好日子,政府就要过紧日子!”毋庸讳言,当前财政收支确有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以身作则,主动过紧日子,对民众、对企业就会产生正向激励的效果,全社会就会响应政府号召,同心协力搞发展,在节流的同时积极开源。

政府过紧日子,体现在压减一般性支出,决不增加“三公”经费,体现在减税降费,还体现在简政放权,遏制乱收费等行为。就在日前,李克强总理在参加全国政协经济、农业界联组讨论时坦言,“砍掉审批是削减权力,砍掉行政性事业收费权那是拆香火,难呐!但为了人民的利益,即便壮士断腕也要推动这项改革。”“拆香火”就是动人奶酪,当然很难,也会遇到重重阻力,但是该拆的必须拆,该砍掉的必须砍,惟有如此才能让老百姓的口袋更好地鼓起来。为国家培植税源、扩大税基,促进了“民富”,就会进

一步推动“国富”。

一方面政府过紧日子,另一方面还要把省下来的钱用在明处、用在实处。更重要的是,在当前国内外形势严峻复杂的情况下,更要优先保障和改善民生,该办能办的实事要竭力办好,基本民生的底线要坚决兜牢。从政府工作报告中可以看出,政府始终把民生当成政之要,时刻放在心头、扛在肩上,今年将出台一系列善政保障和改善民生,让民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享受到更有质量的尊严。

过紧日子已经成为政府常态,可以预见,即便以后各级财政收入大有提高,也不会容忍铺张浪费、追求奢靡。“充分体现人民意愿,全面接受人民监督”,这是政府工作的立足点,也是建立“廉价”政府、廉洁政府的基本前提。通过严密而有效的制度安排,为过紧日子搭建强有力的体制机制约束,我们的政府就会更有公信力、凝聚力。

■一家之言

应对打假命题需形成社会合力

□毕舸

近日,马可波罗瓷砖董事长黄建平告诉记者,今年他的议案将重点关注网络打假以及如何振兴实体经济等问题,并认为实体经济搞不好有马云的“功劳”。

黄建平对于网络打假的关注自有其道理,但如果将视野扩展,更应将制假售假的治理视为需要行政监管强化、司法预防与追责升级、政企合作、线上线下一体化等多维度联动的系统工程,非一两家电商平台、一两地行政管理机构所能独立撑起,而是要从立法、修法、执法等方面予以全方位破解。

作为企业家,就实体经济发展如何获得更多支持,提出自己的想法和建议,是应尽之责。不过也要看到,近期围绕“虚实之争”,似乎反映出某些传统企业家在实体经济遭遇某些困难时陷入了对焦困境——总是将互联网平台与实体经济两者对立,认为互联网就是纯粹的虚拟经济,实体经济单靠自身努力难以突围,责任就在互联网平台上。

其实,“互联网+”恰恰是实体经济振兴之路。2017年1月4日,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醒参会人员要正确认识实体经济的内涵,网店等新经济行业是在为实体经济服务,也是实体经济的一部分。“互联网+”不仅是实体经济扩大销售渠道、客户资源的重要推手,也是推动产品转型升级乃至进一步消除制假售假现象的技术基础。凭借日益成熟的消费者投诉机制、大数据打假技术,以及与地方公安、工商机关的联动,电商打假力度不断增强。这也是电商经济与制造业加快融合发展、进一步降低企业营商成本、提高消费者权益保障水平的表征所在。

因此,对打假难题应有“命运共同体”意识,社会各界都能为如何更好地加快假冒伪劣现象治理出谋划策,真正形成合力,此乃社会发展之福。

■试说新语

□王昱

在网络时代,有些事一晚上就火了。比如说前天晚上,笔者朋友圈里的很多人都在义愤填膺地传一条“渣男地铁要流氓”的视频。视频里一名男子与两名女孩在北京地铁十号线发生口角,男子先是以不堪入耳的秽语辱骂女孩,随后抢夺了对方的手机,最后还把女孩踹下了即将开动的地铁。

视频中男子的表现确实很让人气愤:秽语辱骂女性是要流氓,抢夺手机已构成犯罪,最后那一脚则接近杀人未遂了。与网民的义愤填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视频围观观者的冷漠——整个过程中,座无虚席的地铁车厢里居然没人出声制止,连视频录制者也在男子“行凶”完毕并把目光转

过来时吓得赶紧关了录像。路人冷漠至此,评论者当然要出声说点啥。比如,知名评论员曹林就气愤地表明自己的态度——他要是在场,就会打这个渣男,哪怕为此受罚也在所不惜。

这样的表态确实很解气,但也只是解气而已。仔细分析一下,你会发现这种主张如果真的付诸行动,不仅治不好公众的冷漠病,反而会让它加深——你不在乎“做好人有风险”,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不在乎。我们要知道,大多数人在这种事件中保持沉默,并非因为没有正义感,而是因为担心见义勇为风险太高。如果有人因为见义勇为而打人,并真的受了惩罚,公众看到这则新闻会怎么想呢?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会加重这样一个意识:看来掺和这种事果然会惹麻烦,以后还是躲远一点儿好。这样的“见义勇为”每出一件就会加深一

次公众的冷漠病,对改善社会风气不仅无益,可能还有害。

为何会有如此的悖论?这是因为现代社会为了维护社会秩序,收缴了公民的暴力权,我们不再是中世纪路见不平一声吼的江湖好汉,没有权利也没有义务像鲁提辖那样三拳把人打死,哪怕他是欺男霸女的镇关西。这种“不平”本应由公权力机构去铲除。

然而在这方面,我们的法制建设是严重缺失的,在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受害的女孩在受到侵害后就拿起手机报警,这本来是一个现代社会最正确的反应,但不妨设想一下,即便她报警成功,又能如何呢?根据国内目前实行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警察来了恐怕也只是劝架,只能对男子进行说服教育。

这种“春风化雨”在一个成熟国家是不应该有的,比如我们的近邻日本,很早就对在

公共交通上要流氓(无论是言语还是肢体)的“痴汉行为”进行了司法管束。一个人如果在日本地铁上干这种事,几分钟内乘警就会赶到,受害者很可能会走法律程序,施暴者则会因为惹上这类官司,面临失业等一系列麻烦。当法制对个人权益的维护达到这种程度的时候,还需要再呼唤该出手时就出手式的“见义勇为”吗?如果见义勇为简单到只是打一个报警电话,每一个人都知道公权力会给正义撑腰,哪一个围观者愿意冷漠下去呢?

“渣男地铁要流氓”的视频确实触目惊心,但呼唤以暴制暴式的“见义勇为”实在是搞错了时代。加强法制建设,要求公权力而非公众个体在这种事件中“见义勇为”,才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

■本版投稿信箱:
qilupinglun@sina.com